

元刊西夏文大藏经的几个问题

段玉泉

元刊西夏文大藏经^①的探讨由来以久。上世纪初,王国维先生在考察元刊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残卷时,提及了西夏文大藏经的两则相关材料:其一为元刊磧砂藏《大宗地玄文本论》卷3管主八发愿文中关于河西字大藏经的记载;其二为伯希和于敦煌莫高窟北区发现的捺印有管主八施印题记的河西字大藏经实物残页。王先生指出,“河西字即西夏字”,伯希和发现的佛经残页“盖即管主八所施河西字大藏经三十馀藏之一”^②。此后,聂斯克、石滨纯太郎、王静如等关于《河西藏》的论述多依据相同的材料。而将这一研究推向深入的是史金波,他通过对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的整理及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的翻译,认为有元一代至少5次印施《河西藏》。如今,随着大量西夏文文献的刊布及相关材料的丰富,我们对《河西藏》又有了一些新认识。

一、《河西藏》残存的实物资料及其形制问题

1.《河西藏》残存的实物资料

目前能见到的《河西藏》实物出自三个地方,其一为敦煌莫高窟北区,其二为宁夏灵武,其三为山西太原崇善寺。

出自莫高窟北区、确定为《河西藏》的有3件残片。3件残片的出土时间相距很远。第1件为伯希和于1908年发现,现藏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第2件由张大千于1941-1943年间在北区洞窟中获取,现藏日本天理图书馆;第3件为1988-1995年间敦煌研究院对北区248个洞窟进行清理,在B159窟获得,现藏敦煌研究院。3件残片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在正文空白处捺印一长条形印记,上刻2行汉字“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八施大藏经于/沙州文殊舍利塔寺永远流通供养”。显然,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管主八于大德六年印施的30部《河西藏》之残存。

①亦称“河西字大藏经”。除涉及引用他文,凡指元代刻印的西夏文大藏经,下文一律简称为“《河西藏》”。

②王国维:《元刊本西夏文华严经残卷跋》,《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第1051页。

出自宁夏灵武的《河西藏》实物,现藏国家图书馆。这是1917年宁夏灵武县衙修葺本地城墙时,从5个瓦罐内发现的众多西夏文文献的一部分。其中可以确定为《河西藏》的佛经3件:B11·049(3.17)《悲华经卷第九》、B11·050(4.01、4.02)《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卷第五》、B11·051(di7jian)《经律异相卷第十五》^①。三件佛经经卷前插有一组相同的版画,版画祝赞部分刻西夏文题款,有“大德十一年”、“印制一全大藏经”、“五十部”等语。无疑,这三件佛经为大德十一年印施的《河西藏》实物遗存。

出自山西太原崇善寺的《河西藏》残片,需要特别说明。李际宁在《一部特殊的“图录”——介绍山西省太原崇善寺摄影集》一文^②中曾介绍,在太原崇善寺这一摄影集中,有一幅西夏文大藏经残片照片,所附照片说明云:

西夏文经首残片,为西夏国王李元昊与野利仁荣所创,元大德年间松江府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刻之一,非常贵重。

李先生指出,日本百花苑出版的《大藏经-成立と变迁》一书中竟然有一幅完全相同的照片,并将这两幅照片同时附刊于文中。两相比较,二者的确完全相同,只是摄影集中那幅照片多出了两行说明文字。李先生进一步指出,原来《大藏经-成立と变迁》一书中所用的图版,竟是山西崇善寺的旧藏。并因此而产生疑问:莫非在崇善寺“图录”之前,日本人已经将崇善寺的资料做了摄影?这张残片原件现在何处?日本人是否早于“图录”之前做了摄影,暂且不论,只是残片的原件,如今有了下落。

笔者近在《晋图论坛》上发现一则史金波鉴定山西省图书馆馆藏西夏文献残片的意见:

山西省图书馆传来馆藏照片两页,经鉴定系元刊西夏文佛经的卷首说法图和祝赞,因失经名,不能确知何经。

国家图书馆藏同类佛经有《悲华经》卷第九、《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卷第五、《经律异相》卷第十五,系经折装。约高33、宽12厘米,上下双栏,栏高23.8厘米。卷首有佛说法图一幅3面,祝赞4面,韦陀像1面。祝赞第1面西夏文3行译文“奉大元国天下一统世上独尊福智名德俱集 当今皇帝圣寿万岁敕 印制一全大藏经流行”,第2面译文“当今皇帝圣寿万岁”,第3面译文“太后皇后与天寿等”,第4面西夏文3行译文“奉敕大德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皇太子寿长使见千秋,印大藏经五十部流行”。

贵馆所藏为卷首佛说法图第3面和祝赞第一面。

①史金波、陈育宁:《中国藏西夏文献》(5),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219-262页。

②李际宁:《佛教大藏经论稿》,北京宗教出版社,2007年。

山西省图书馆藏有西夏文文献一事,此前学术界一直未有所闻,以致新近出版的《中国藏西夏文献》未能反映。笔者将李际宁提供的照片与史金波的鉴定比照。细核照片,这实际上是由两件版画的残片构成:其中第一片与上文所说的国图藏大德十一年《河西藏》卷首说法图第3面完全相同;第二片上刻有西夏文字,第一行小字可译为:“大元国天下一统世上独尊福智名德俱集”,第二行大字可译为:“当今皇帝圣寿万岁敕”,第三行小字下缺,存四字,可译为:“奉敕一全……”,构图及残存文字则与大德十一年《河西藏》祝赞第一面全同。不难发现,照片所反映的实际情况与史先生所说的“贵馆所藏为卷首佛说法图第3面和祝赞第一面”不谋而合。可以推知,山西省图书馆收藏的西夏文献残片,实际上就是原藏于太原崇善寺而后又下落不明的《河西藏》实物残片,而且这一实物又与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大德十一年《河西藏》为同一版本。

2.《河西藏》的形制探讨

管主八施印的三件《河西藏》实物虽皆为残片,但将它们考察清楚,有助于《河西藏》形制的探讨。三件藏品中,敦煌研究院藏 B159:26 号及法藏 Pelliot Xixi924 (Grote) 110、112 号均有考察结果。敦藏 B159:26 号,上下双栏,仅存经文 3 行,楷书,为一经末尾,尾书“龙树菩萨禅陀迦王说法要偈 言”。“言”为该经卷所标函号。后尚有汉字“三”。史金波先生将其定名为《龙树菩萨为禅陀迦王说法要偈》^①,经末有一长方形压捺印记“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八施大藏经於沙州文殊舍利塔寺永远流通供养”。

法藏 Pelliot Xixi924 (Grote) 110、112 号最近由《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刊布,这一广为流传的《河西藏》实物原来包括可以拼合起来的两个残片,分别编号为 110、112,此前束锡红在《敦煌研究》附录的图版只是其中的 110 号。笔者曾经依据 110 号仅有的三行残缺文字判定这部佛经为西夏文《大智度论》卷 87 的残片,但每行 16 字的推断,现在看来实在是个误判。因为 112 号恰好就是 110 号撕裂掉的上一部分,《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的编者很好地将二者拼合了起来。拼合后的图版亦上下双栏,存经文 3 行,行 17 字。存题卷“大智度论卷八十七 能”。

日本天理图书馆藏实物图版见西田龙雄《西夏语之研究》卷 1 之附录^②。此页上残,下有双栏,存西夏文六行,汉文印记压捺在第 3 行下的空隙处,并超出下双栏线。残页上的西夏文内容转译如下:

有界内,非无色界。五趣俱有。

慈授子,生地狱中,是浴室

说颂言:

受者,非我亦非他所行。

^①史金波:《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西夏文献初探》,《敦煌研究》2000 年第 3 期第 9-10 页。

^②西田龙雄:《西夏语之研究》,日本东京座右宝刊行会,1966 年,PLATE5。

是缘,身不灭我曾受闻。

量众生,闻此颂已,脱地狱苦。

此残页《西夏语之研究》图版题为“管主八之愿文”,松泽博在《敦煌出土西夏语佛典研究序说》文中题“未详佛典”^①。前者是就残页上的汉文印记而言,后者是就西夏文佛经本身而论。通过与汉文大藏经的比对,可以发现,这段文字比较接近《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第二十九近末尾的一段文字^②。不同处在于“颂言”内容表述有别,西夏文的转译为“非我亦非他所行”、“身不灭我曾受闻”,而汉文大藏经为“非我非他之所作”、“身若灭无谁复受”。显然,这只是句式选择有别,并无内容上的出入。

此残页上部残缺,6行文字中,第1、2、6行残存部分均为满行文字,每行存11字。对照汉文大藏经原文,可以推知第2行上缺“有地狱有者,如”6字,第3行上缺“谓,见诸苦具,便”6字。可以推定此佛经足行经文为17字,这与法藏《大智度论》残片一致。

国家图书馆藏大德十一年《河西藏》保存的三件实物《悲华经卷第九》、《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卷第五》及《经律异相卷第十五》形制完整,可归纳如下:

①经折装。佛经正文每纸6折面(版画每纸4折面),面6行,行17字。佛经经题下有西夏文经卷函号。

②佛经卷首有一组相同的版画。版画由两纸粘贴而成,每纸4折面,含说法图1幅3面,祝赞4面,韦陀像1面。祝赞中有西夏文题款,译文据史金波先生翻译为:“奉大元国天下一统世上独尊福智名德俱集当今皇帝圣寿万岁敕,印制一全大藏经流行,当今皇帝圣寿万岁,太后皇后与天寿等,奉敕大德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皇太子使见千秋,印大藏经五十部流行。”^③

③版端接纸处首刻一西夏文字,余皆为汉字。西夏文字为每经卷函号;汉字内容依次为经名、卷次和刻板序数,间或有刻工名字。

④版幅高33cm、宽12cm左右,上下双栏,间有单栏,栏高23.8cm左右。

管主八施印的《河西藏》实物残损严重,没有办法就上面几个特点逐一比较,但还是可以发现二者有相同之处:经折装,上下双栏,每折面文字6行,行17字,佛经经题下有西夏文经卷函号。

经卷首题、尾题之下以及版端接纸处顶部刻有西夏文字函号,应视为《河西藏》的一个显著标志。再辅之以经折装、每折面文字6行、行17字等特点,可以进一步判定另外几件文献亦当属于《河西藏》。它们是:

①松泽博:《敦煌出土西夏语佛典研究序说》,《东洋史苑》第36号第76页。

②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7卷第152页下栏。

③史金波、王茵等:《国内现存出土西夏文献简明目录》,载《国家图书馆学刊·西夏研究专号》2002年增刊,第221-22页。按,“六月二十五日”应译为“六月二十二日”。

1.敦煌研究院藏 B160:22 残片,无正文,仅存版端接纸处,上刻一西夏字,当为函号,接书汉文“文殊师利问地经已(卷)上”,无刻板序数、刻工名称。这些特征与国图藏《河西藏》比较接近,应为元刊《河西藏》的一种,考虑到和管主八施印《河西藏》三个残片出土地相同,可能属于同一藏。

2.国图藏《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xix1.16) 面6行、行17字。版端接纸处首刻西夏字函号,次为汉文经名、卷次,下有刻工“台周”名字。根据发愿文题皇庆元年(1312)的记载,知此经正是发愿文所说“皇庆元年八月望日印毕”的《河西藏》。

3.国图藏《金刚萨埵说频那夜迦天成就仪轨经卷第二》(xix1.18) 面6行、行17字。版端接纸处有函号、汉文经名、卷号,下有刻工“台周”、“周子俊”、“王子正”等名字。接纸处的汉文经题为“大悲经”,当属误刻。

4.国图藏《不空羼索神变真言经卷第十八》(xix1.19) 面6行、行17字。版端接纸处有函号、汉文经名、卷号、板序号、刻工“周子俊”“任”等,但刻字全为阴文。

5.国图藏《菩萨地持经卷第九》(xix3.15) 面6行、行17字。版端接纸处有函号、汉文经名、卷号、板序号、刻工“卜”,另刻有“五万册五□”。

6.国图藏《大智度论卷第四》(xix3.15) 面6行、行17字。版端接纸处有函号、汉文经名、卷号、板序号、刻工“翁”。

二、大万寿寺本《河西藏》的雕刻与印施问题探讨

论及《河西藏》,人们往往和管主八联系起来,特别是将杭州大万寿寺刻本视为管主八负责雕刻。上世纪30年代初,聂斯克、石滨纯太郎就有相关论述:

又自罗太后发愿写经以后,至管主八刻经之间,就西夏国情论,雕刊全藏事能行与否,亦属疑问。管主八之大万寿寺本定为唯一之全藏刊本也……^①

王静如《河西字藏经雕版考》一文亦有记载:

至大德六年雕版始克完备,后即施于西夏诸寺院。而内容果如何耶?吾辈固不能不注意此次雕印之主办人也。日本善福寺藏元平江路磻砂延圣寺刊《大宗地玄文本论》卷后有大德十年松江府僧录管主八愿文,载大德六年,河西字雕版完备,与施河西字藏经于宁夏之事,则主持人当为管主八无疑。^②

最近发表的相关文章大都仍持相同说法,将大德六年于杭州路大万寿寺

^①聂斯克、石滨纯太郎著,周一良译:《西夏语译大藏经考》,《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4卷3号《西夏文专号》1931年第74页。

^②王静如:《河西字藏经雕版考》,《民国丛书》本《西夏研究》(第一辑),上海书店,1989年,第5页。

刊印《河西藏》之事与管主八印造《河西藏》等同起来,视为管主八主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史金波首先注意到《大宗地玄文本论》卷3管主八发愿文的记载与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有相矛盾之处,前者记载印造“三十馀藏”,后者言大德六年始成,“奉上敕施印十藏”,两者数量不合。史先生因之提出大德六年两次印制的观点,第一次印制10藏,第二次印制30藏^①。作两次印制的区分是可信的,但一年内两次印制,颇令人怀疑。而当我们对这两则发愿文细加比较、深入推敲之后发现,管主八是否主持雕刻《河西藏》、管主八印造《河西藏》又是否在大德六年便成了疑问。

先看《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发愿文的相关介绍:

上师三宝佛法加持之德,皇帝太子诸王复护之恩,管主八誓报四恩,流通正教,累年发心印施汉本大藏经五十馀藏……心愿未周,钦睹圣旨,于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刊河西字大藏经三千六百二十馀卷、华严诸经忞板,至大德六年完备。管主八钦此胜缘,印造三十馀藏及华严大经、梁皇宝忏、华严道场忏仪各百馀部,焰口施食仪轨千有馀部,施于宁夏、永昌等路寺院,永远流通。……大德十年丙午腊八日,宣授松江府(路)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巴谨题。^②

问题可能出在对“于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刊河西字大藏经三千六百二十馀卷、华严诸经忞板”一句话的误读,即误将皇帝圣旨中的内容当作管主八所发出的行为。奉圣敕雕刻的《河西藏》经板于大德六年完成,从圣旨发出到经板雕刻完毕,这一善缘令管主八敬仰,才有下文“钦此胜缘,印造三十馀藏……”之说。如果是他本人负责雕刻,那么胜缘正是他自己,他应该受到别人敬仰,而不是他所说的“钦此胜缘”。那么到底是谁在负这一雕刻之责呢?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给出了回答:

后奉护城帝敕,与南北经重校,令国土茂。慧提照世,法雨普润天下,大夏为池,诸藏潮全无毁。皇元界朝连,中界寂澄,上师结合胜弱,修整一藏旧经。至元七年,化身一行国师,广生佛事,具令校有译无。过如意宝,印制三藏新经。后我世祖皇帝,恩德满贯天下令各国通。高道胜比万古,四海平安。八方由旬时经,深信三宝。因欲重举法幢,法师慧宝,深穷禅法密律,志多长意,上圣欲愿满故,令经院鲜卑小狗铁等报,以不可解德音,发出圣敕,江南杭州实板当做己为,以主僧事鲜卑土情行敕,知觉和尚慧中,始为先遣。龙象师中选有多行者,以取旧经,先后二十余人。至元三十年,万寿

①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07页。

②王国维:《元刊本西夏文华严经残卷跋》,《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第1051页。按,相同的愿文亦藏于国家图书馆和山西崇善寺,三个藏品尚存些微差别。例如,“印施汉本大藏经五十馀藏”,国图本作“三十馀藏”,当误。因为崇善寺本提“五十馀藏”,又磧砂藏《圣妙吉祥真实名经》发愿文有:“管主八累年发心,印施汉本、河西字大藏经八十馀藏”,结合本愿文提及印制河西字大藏三十馀藏,可知汉本大藏经为五十馀藏。

寺中刻印,应用千种、施财万品数超过。成宗帝朝,大德六年夏始告完毕。奉上敕印施十藏。^①

管主八发愿文所言奉圣敕雕刻《河西藏》经板,于大德六年完备之事在此得到印证且更为完备。原来杭州大万寿寺雕刻《河西藏》的详细情况是:雕刊的圣旨是由世祖皇帝发出的,促成皇帝下达圣旨的关键人物是鲜卑小狗铁;执行皇帝圣旨的人为鲜卑土情,参与这一工作和雕刻的人员有知觉和尚慧中、龙象(喻有德高僧)师中多行者,及参加旧经(当指至元七年,一行国师主持印制三藏新经)雕刻的人员二十余人;雕刻采用杭州实板,在万寿寺中执行;雕刻从至元三十年(1293)开始到大德六年(1302)夏结束,时间跨世祖及成宗两朝;雕刻完成后印施十藏。

杭州万寿寺雕刻《河西藏》,实际的主持人应该是执行皇帝圣旨的鲜卑土情和“始为先遣”的知觉和尚慧中。发愿文中的“行敕”和“始为先遣”很能说明问题,“行敕”是执行皇帝的命令,“始为先遣”应该是雕刻前的策划及准备工作。看来,管主八并没有参与其中,这与上文对《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发愿文的理解是一致的。

那么,管主八“印制”的30余藏该如何理解呢?他是重新雕刻印制还是在万寿寺刻本基础上重新印刷的呢?根据目前的材料这里不妨进行一番推测。根据《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发愿文记载,管主八在施印《河西藏》之前曾使用旧版印施碓砂经50余藏,同样就有可能用旧版印施《河西藏》,除非没有现成的旧版。而且,发愿文在词语的使用上也能体现出差别。《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发愿文提“印制”30余藏,日本藏碓砂藏《圣妙吉祥真实名经》发愿文则提“印施”汉本、河西字大藏经80余藏,凡涉《河西藏》皆未出现“雕”、“刻”等词语,而下文关于碓砂延圣寺大藏经版未完部分及秘密经律论部分,明确使用“雕刊”、“刊雕”等字眼^②。如果管主八亦雕刊《河西藏》,也应该附有类似的发展文,完全没有必要在佛经刊成之后再捺印“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八施大藏经於沙州文殊舍利塔寺永远流通供养”这样的题记。因此,可以肯定,管主八并未雕刻《河西藏》,只不过是使用旧板重新“印制”而已。类似的情况同时期很多,西夏遗民李慧月曾经施印《普宁藏》,但并不“是他本人或者是在他的隶寺中雕刊了这些佛经”^③。管主八既然使用旧板“印制”,就极有可能是杭州万寿寺板,因为这套《河西藏》经板仅印十藏,废而不用,浪费大矣!

非但如此,此后出现的《河西藏》都是在旧板基础上印制的。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提到的武宗至大年间(1308-1311)50部及皇庆元年(1312)的50部分别使用了“施印”和“重印”等词,未见重新雕刻迹象。而这

①史金波:《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译证》,《史金波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312-331页。

②松泽博:《敦煌出土西夏语佛典研究序说》,《东洋史苑》第36号78页。

③李际宁:《关于“西夏刊汉文版大藏经”》,《文献》2001年第1期,第141页。

则雕刊的发愿文行格字数又细又密,完全不同于佛经正文的雕刊风格,明显是重印时补刻进去的;大德十一年《河西藏》三件实物前的版画也与正文文字有很大差别,同样应该是印制时补刻进去。这些《河西藏》佛经主体皆使用旧版,其版极有可能还是杭州大万寿寺板,因为万寿寺板从至元三十年(1293)始到大德六年(1302)夏结束,前后费时十年雕刻而成,而从大德六年至皇庆元年(1312)也只有十年时间,却多次印刷,即便重新雕刻,时间也不允许。

至于管主八施印《河西藏》的具体时间,发愿文并无明确显示。一般视为大德六年,这就意味着一年内两次施印《河西藏》。这种可能性应该很小,即使是在印刷业高度发达的今天,除非畅销读物,大部分出版物不可能一年内再版,何况是元代的一种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不过,管主八施印此经的时间范围是可以推测出来的,其上限在大德六年夏以后,其下限根据发愿文中“近见平江路磧砂延圣寺大藏经板未完,大德十年闰正月为始,施财募缘,节续雕刊(续磧砂藏)”的记载,在大德十年闰正月之前早已完成。而且在此时间内,除印造三十馀藏《河西藏》等外,还装印西蕃字乾陀、般若、白伞盖三十馀件、经咒各千馀部。因此,管主八印造三十馀藏《河西藏》的时间可以大略地限定为大德六年夏至大德九年底之间。

这样,可以大致推定,元初一行国师印制《河西藏》后,至元三十年(1293)始花费十年时间雕刻完成大万寿寺刻本《河西藏》,此刻本先后于大德六年(1302)、大德六年夏至九年底(1302-1305)、大德十一年(1307)、至大年间(1308-1311)及皇庆元年(1312)分别印制10部、30部、50部、50部、50部,凡190部。管主八只是其中一次的施印人。

三、《河西藏》与汉文南系大藏经之关系

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记载:“后奉护城帝敕,与南北经重校,令国土茂。”^①史金波已经指出,护城帝即西夏仁孝皇帝。关于“与南北经重校”,他认为:“‘南经’当指西夏之南的宋本。至仁孝时期,宋朝刻印完毕的大藏经已不止一部,但作为西夏校经的底本,可能还是采用官刻本《开宝藏》。”^②西夏的汉传佛经翻译以《开宝藏》为底本当无疑义,但作为校勘,即便是重校,“南经”仅仅选择原翻译底本可能性不大,应该有别种参校版本的可能。

近些年来,佛学研究界提出了宋元汉文大藏经分南、北、中三个系统的理论。提出这些观点的是日本学者竺沙雅章和中国学者方广锬。三个系统归纳起来,中原系统以《开宝藏》为代表,版式特征是:卷轴装,每版23行、行14字,版端刊经名简称、卷次、板片号、千字文号;南系以《崇宁藏》、《毗卢藏》为代

^①《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译证》,《史金波文集》,第325页。

^②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3页。

表,版式为:经折装,每版36行或30行,半页6行,行17字,此后,《思溪藏》、《磧砂藏》、《普宁藏》等均沿着这一形式,为同一系统;北系以《契丹藏》为代表,版式为:卷轴装,上下单边,每版27-28行,行17字^①。三个系统可能是在大藏经发展历程中逐步形成的,西夏仁孝时代提出的“南北经”有无可能与此画上等号呢?

熊文彬比较了南系《普宁藏》与《河西藏》中的两幅版画后指出《普宁藏》发一《大集譬喻王经》扉画《教主释迦牟尼佛说经处》与国图藏大德十一年《河西藏》卷首的说法图有着惊人的相同:二者均采用中心构图法,佛与弟子位于画幅中心,座前为五供和汉装供养人。背光顶部为宽大的棕榈形的菩提树和题记。佛两侧分别为闻法的诸佛、菩萨、僧众和护法^②。这一惊人的相同预示着,《河西藏》与南系大藏经《普宁藏》似乎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种联系还可以从诸多方面补充些新线索。首先,在装帧方式上,《河西藏》采用了经折装,每折面6行,行17字,与《普宁藏》完全相同。其次,在刊刻地上二者很近。《河西藏》是在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刻而成,南系《普宁藏》是在杭州路余杭县白云宗南山大普宁寺。再次,刊刻时间大致接近。《普宁藏》始刻于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至元二十七年完成;《河西藏》始刻于至元三十年(1293),大德六年(1302)夏完成。《普宁藏》略早于《河西藏》且近乎前后相继,后出者难免不有所继承或借鉴。最后,我们还可以从参与人员方面发现诸多线索。王菡曾研究了大德年间雕印西夏佛经的刊工与《普宁藏》的关系,认为“《普宁藏》与大德年间雕印的西夏佛经的刊工们曾经共事,而且这些刊工既刻儒家之书,也刻佛教之卷;既刻汉文之典,亦刻西夏文之册。”^③虽然该文用于比较的西夏文佛经《慈悲道场忏罪法卷第一》并非大藏经本,考虑到刻经地点相同,相距时间甚短,这些刊工同时参与《河西藏》的刊刻,应该是可能的。王菡还指出,《普宁藏》的官方主持人永福大师杨琏真加或为西夏人^④。此外,我们还可以在《普宁藏》的很多佛经上看到捺印有西夏遗僧李慧月施财刊刻的牌记^⑤。

看来,《河西藏》的刊刻及流传与南系《普宁藏》的确有着密切的联系,《普宁藏》先于《河西藏》刊行,难道《河西藏》受《普宁藏》影响而来?

最近,笔者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留意到了两件材料——西夏文写本《佛说

①李际宁:《刻本大藏分南北中三个系统》,《中国版本文化丛书·佛经版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5-57页。

②熊文彬:《从版画看西夏佛教艺术对元代内地藏传佛教艺术的影响》,《中国藏学》2003年第1期,第78页。

③④王菡:《元代杭州刊刻〈大藏经〉与西夏的关系》,《文献》2005年第1期,第115页。

⑤据李际宁调查,目前至少发现有8件《普宁藏》的佛经上有西夏遗民李慧月的西夏文或汉文牌记,其中西夏文牌记3件。见李际宁《西夏遗民李慧月的法宝因缘》,《中国版本文化丛书·佛经版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145-147页。

宝雨经卷十》及《佛说长阿含经》。两件写本上皆有皇太后罗氏的施经牌记,译文为:“大白高国清信弟子皇太后罗氏新写全增番大藏经契一藏,天下庆赞,已入寺内经藏中,当作为永远读诵、供养。”无疑,这是罗氏施写的一部西夏文大藏经中的两件实物资料。两件佛经虽为写本,但书写精美,排列整齐,且每折面6行,行17字,这与通常所见的西夏本佛经有所出入。目前出土的西夏佛经资料很多,其装帧方式具有多样性,版式上特别是行格字数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即便是刻本文献也多如此,如《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有蝴蝶装者亦有经折装者,半页之内往往13、14、15字不等。写本文献虽然也还有一些书写精美、排列整齐的,但每折面6行,行17字的写本目前仅见此两例。这一行格字数的特点恰恰与南系诸大藏经的特点一致。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存在着一定联系或影响?前文提及仁孝时期以南、北经重校,而《佛说宝雨经》经题后的三行题记中,末一行恰恰为仁孝皇帝的校勘题记,很有可能就是经过这次校勘而使西夏文大藏经在形式取得了一致。因此上述发愿文中提到的“南经”很难想象是每行14字的《开宝藏》,它更有可能是仁孝时期(1140-1193)早已形成的《崇宁藏》(1080-1104)、《毗卢藏》(1112-1151)等南系佛经。

看来,元刊西夏文大藏经与汉文南系大藏经风格接近,是早在西夏时期就已初步形成的;到了元代,因为刊刻的地点和人员的因素,又和《普宁藏》等南系佛经有了更密切的联系。因此,如果将大藏经分南、北、中三系,从汉文大藏经的条框中跳出来,那么,我们甚至可以直接说《河西藏》也属于南系大藏经。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